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翻译 的理论建构 与文化透视

谢天振 主编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42.35
616

Constr
rom a



01011196587\$ 郑州大学图书馆

ation
ective

翻译

的

理论建构

与文化透视

谢天振

主编



WJ
外教社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谢天振主编.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ISBN 7-81046-886-3

I. 翻… II. 谢… III. ①文学—翻译理论—理论研究—文集②翻译—教学研究 IV. 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8981 号

出版发行: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上海外国语大学内) 邮编: 200083

电 话: 021-65425300 (总机), 65422031 (发行部)

电子邮箱: bookinfo@sflep.com.cn

网 址: <http://www.sflep.com.cn> <http://www.sflep.com>

责任编辑: 陆英英

印 刷: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75 字数 368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2 000 册

书 号: ISBN 7-81046-886-3 / G · 936

定 价: 21.50 元

本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1998年12月2日至5日,由上海外国语大学社会科学院主办、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协办的'98上外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来自欧洲、北美、南美、亚洲、非洲、大洋洲以及我国的香港、台湾等地的2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国外和海外学者,与来自全国各地的30多名学者汇聚申城,共同探讨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的有关问题。这是20世纪末我国译学界的一次高层次的学术盛会,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带来了东西方译学界对当前国际翻译研究界理论热点问题的思考,提出了他们对翻译研究理论建构的设想,同时也对以往的翻译研究进行了深刻的文化反思。

本届翻译研讨会的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地20几个国家和地区,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会议的国际性。因此,会上代表们的发言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今国际翻译研究的趋势和动向。

这次会议着重探讨的是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这是一个比较宽泛的议题,但大家的发言比较集中在国际翻译理论的最新热点问题上。虽然与会者的文化背景、经验来源各不相同,但发言涉及的问题却不乏相通之处。这样,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从不同角度的思考,但他们的思考无论是契合还是分歧,都对同一问题构成了互文关系。因此,我们把与会学者们的发言和论文,根据探讨

的范围、内容和性质,组成几个内容相关的单元,便于读者相互参照,生发出新的思考。所以,就某种意义上而言,这部论文集也因此具有了一部译学专著的性质。

从这次大会中外学者的发言看,文学翻译和翻译教学是大多数学者关注的问题,因此本论文集在选择入选论文时也较多侧重于文学翻译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我们也酌收了几篇从语言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探讨的论文,以便让读者窥见这次会议的全貌。另有些文章,由于作者是根据其所在国家翻译教学的经验写成的,地区特性太强,缺乏普遍意义,因此没有选用;还有一些不错的论文和发言,因未能与作者联系上,没有原文,也只好付诸阙如,但读者可以从本书附录的论文摘编中窥见其主要观点。

二

这次会议大多数学者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翻译理论的性质、翻译的文化语言特性、文化语境与文学翻译、翻译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口笔译翻译教学等几个方面。

著名翻译理论家、英国伦敦大学西奥·赫尔曼教授在其《翻译的再现》中对等值和透明的翻译思想提出了质疑,并从文化角度作出反思。他指出,翻译涉及的“先前文本”绝不是单纯的源文本。译者总是在一定的翻译概念和翻译期待的语境中进行翻译的,所以翻译总是特殊的翻译。译者从来就不会“仅仅翻译”(just translate),译作不可能做到透明。翻译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之所以引起人们的兴趣,正是因为翻译缺乏中立性和单纯性,同时还因为其不是透明的,添加了额外的东西。翻译史上各阶段都留下许多二元文本、无数的复译本和超时代的现存译本的修订本,这给我们提供了一系列独特的、可理解的“他者”文化结构。因此,翻译史给我们提供了文化自我界定作品的独特的第一手证据。翻译告诉我们更

多的是译者的情况,而不是译本的情况。

我们常常听到翻译家对翻译理论的微词,认为翻译理论对翻译实践起不到多大的作用。实际上,这种对翻译理论的看法具有较大的普遍性。在翻译研究越来越深入、翻译理论层出不穷的今天,作为翻译研究者,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并回答这个问题:翻译理论究竟有用吗?翻译研究分为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翻译研究,纯理论翻译研究又分为描述性翻译研究和理论性翻译研究。香港城市大学朱纯深先生认为,对“翻译理论是否有用”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首先考虑两个更深层的问题:①我们所说的到底是什么翻译理论?②我们又是如何在翻译实践和教学中应用自己所质疑的翻译理论的?朱纯深先生结合西方主要翻译理论家对翻译理论的阐述并通过具体事例的分析,说明“健全的方法论和科学的话语规范对于翻译研究的必要性”。一个有效的翻译理论应该是客观的、分析性的、理性的,而不应是经验的、感性的、情感的。应用性纯翻译理论充当了翻译研究的开拓者,应该具有适当的地位(“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翻译理论不仅要指导实践和教学,而且还要解答:翻译的本质是什么?译者是怎样进行翻译的?其思维过程是怎样的?简而言之,要解答“翻译是什么”这个翻译研究的“元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同样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关系到我们对翻译过程的理解。对翻译的本质、思维特征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西方的一些翻译理论家从信息论、控制论、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理论阐述。香港城市大学沈景炬先生认为,一些对翻译性质描述的模式和比喻貌似给我们展示了一个清晰的图像,实际上这个图像带有很大的欺骗性,导致了翻译研究和翻译培训从以翻译结果为中心转向以翻译过程为中心(“翻译中的幻像与迷误”)。香港岭南大学孙艺凤副教授也对近年来在翻译研究中有一定的代表性的罗杰·贝尔(Roger Bell)关于翻译过程的理论分析和描述的观点进行了质疑。

孙艺风认为,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构码和再构码的任务远不是仅仅传递信息那么简单。在文学作品中,信息是怎样转达的,或者是怎样歪曲的,或者是怎样转达不够的,或者是怎样不转达的,都与构码、与再构码有紧密的关系。这其中牵涉到阐释学,更包含效果传递的问题。孙文对以上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文学翻译的过程”)。中国翻译理论的建构是近年来中国翻译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西方译论不适合中国,因此呼吁在中国传统译学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香港岭南大学张南峰副教授对这种说法提出相反意见。他认为,我国翻译研究界对西方许多译论,特别是新的翻译理论不熟悉,更谈不上在实践中运用和验证。中国翻译界所说的翻译理论,大多处在微观、具体操作层面上,是应用性理论而并非纯理论。“特色派”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指导作用。“中国翻译学”的提法,过分突出国别翻译学的地位,是民族偏见的产物。我国没有纯翻译理论,因此,必须向外国借鉴,作为研究我国翻译现象的框架,然后加以改良,从而参与世界翻译学的构建(“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的关系”)。

以前人们对翻译的认识和探讨基本囿于具体的语言艺术层面,局限于翻译标准的辩难和译本字比句次式的比较。近十年来,随着比较文学的译介学理论对译学的浸润,以及其他学科理论,如心理学、符号学、阐释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批评等当代文化理论的推进,翻译研究者获得了新的多元化的理论视角来切入译学研究,突破了原来狭窄的研究空间,译学研究呈现出一个新的、令人振奋的、可自由驰骋的广阔的空间。这次研讨会上就有一些学者从文化哲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新的探讨,以期拓展翻译研究的层面。

翻译,无论是文学翻译还是非文学翻译,都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翻译的这种性质决定了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的极其密切的关系。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通过分析现代阐释学

两个代表性人物伽达默尔和赫施关于作者“本意”和文本“含义”的不同观点,以现代阐释学的观点透视翻译研究。伽达默尔认为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理解主体和理解客体都处于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就翻译而言,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性使得理解的客体(原作)和理解的主体(译者)都具有各自的处于历史演变中的“视域”,而总是以自身的文化“先结构”为依托去理解,达到“视界融合”,因此,译作不是消极的原作的复制品,而是不可避免地带上翻译家自身的文化意绪,是创造性的劳动成果。赫施不同意伽达默尔关于作者“本意”不存在的观点,认为文本的“含义”是确定不变的,变化的是文本的“意义”,即作者与文本的关系。赫施的观点充分解释了不同时代的译者对同一文本在翻译上的不同处理的原因(“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和翻译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卫茂平教授则从比较能表现海德格尔翻译观的“阿那克西曼德之箴言”一文入手,分析这位本体论大师对翻译问题的看法,管窥其译学思想(“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上海铁道大学葛中俊副教授从语言的异质出发,说明语言对文学翻译的制约,从而对可译性问题作出了新的解释。他还对文学翻译属性的结构层次作出划分,旨在对文学翻译的实质进行诠释(“语言哲学观照下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

北京大学孟华教授在“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辨”一文中,从翻译在文化相异性和认同性的转化中所起的作用来探讨翻译与文化交流的关系。她指出,在中国翻译史上,译者都自觉不自觉地处在两个向度的张力之中:既要力求保持原有的文化传统,又要在此一文化传统所归约的社会、文化体系内引入相异性。译者采取种种变通翻译策略,将文化的相异性转化为本土文化能相容纳的因素。因此,译作可以使我们看到相异性和认同性之间交互作用的具体运作过程。既然任何一种文化在植入相异性时都要对原作作相应的本土化改造,那么,被传递的因素就不可能是真

正的“相异性”。实际上是一种近似“相异性”的因素,也就是相似性。

中国人民大学杨恒达教授以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为基础,涉及翻译中译者如何对待原作作者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翻译必须以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为前提,翻译就是译者否定自己,进入文本作者主体的过程。确立作者主体的可认知性,就是以理解作者主体为根本目的,不仅要理解文本,还要全面掌握作者本人。在翻译中,必须深刻理解交往理论中的主体间性问题。译者在翻译中承担着将两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体性融会贯通的任务。翻译的实践需要对主体间性问题的深刻把握,所以,翻译的实践将会在生活世界的实践中促进人们对主体间性问题有更深刻的把握(“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

文化研究是近几年来文化学术界比较热门的话题。从文化层面来研究翻译,将翻译研究的视野扩大到社会文化界面,这样我们可以从一个宏观的视角来透视翻译过程中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作用。

香港中文大学王宏志教授分析“五四”时期有关翻译的讨论,特别探讨了引入“欧化”成分时所引起的争议。从晚清开始的文学翻译,译作语言经历了文言、白话、“欧化”语言几个转变过程。这种变化并不纯粹是语言问题,而是与当时的文化语境有密切关系。译者对译作的语言形式的择取不单纯是译者个体的审美倾向的反映,更折射出当时主流文化的特征(“‘欧化’:‘五四’时期有关翻译语言的讨论”)。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学者查明建通过对中国新时期译介西方现代派文学语境的分析,生动地揭示了特定时代的文化语境对文学翻译择取和译介方式的制约和影响(“现代派文学在新时期译介的文化语境与译介策略”)。巴西圣保罗大学约翰·弥尔顿先生则以巴西大众小说的翻译为例,分析了以大众为价值取向的翻译的特点。大众小说不仅是指原作的大众性,还指翻译通

过一定的包装和改变使经典作品“大众化”这一现象。他详细地探讨了巴西小说翻译大众化方面的具体特征和操作形式,如小说翻译的“工厂化”现象;小说翻译的语言在风格、叙述和篇幅上以是否符合时尚为标准;译者的个性化特征不再存在;删节、改编现象严重;复译现象比较普遍,等等。总之,小说翻译的择取和译作存在形式都以市场为导向(“大众小说的翻译”)。这几篇文章都是以生动的典型事例着手,从文化语境角度来分析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干预和制约作用。不同的文化语境不仅制约了翻译的择取,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作存在的形态。上海外国语大学青年学者南治国分析美国诗人霍斯曼的作品在中国的译介,揭示不同译者、不同历史时期对一个外国作家接受的变化,以及霍斯曼的诗歌给新格律诗派诗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新诗的发展(“A.E. 霍斯曼的诗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作为中国翻译研究者,中国翻译研究界的学者对中国翻译的现状、翻译理论的建构、翻译批评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副会长林茂荪先生在题为“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译界”发言中,回顾了新时期以来我国翻译的现状,总结了翻译研究和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和不足。面对新世纪的要求,他提出了中国翻译界的努力方向。浙江大学郭建中教授在论文中回顾了从 1987 年到 1997 年,此十年里中国翻译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争论(“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界十年大辩论(1987—1997)”)。海南大学青年学者穆雷回顾、总结了从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翻译教学的发展,对中国翻译教学的发展趋势作出预测(“中国翻译教学百年回顾与展望”)。翻译批评是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成为翻译界关注的一个领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翻译批评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对此,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孙致礼教授分析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

译者的文化身份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关注的问题。译者既是一种社会性职业,更是两种文化的沟通者。译者的文化个性渗透在译作之中,从动态的文化交流中获得自己文化身份定位。香港浸会大学张佩瑶博士从社会学角度,以基督教传教士在香港的翻译活动(1842—1900)为个案,探讨了译者如何通过翻译这项活动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获得权利,从而揭示在特定时期和特定文化区域内,翻译与权力、翻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从基督教传教士在香港的翻译活动(1842—1900)论翻译与权力的关系”)。加拿大著名翻译理论家罗德·罗伯茨提出了一个为人们忽视而又必须解答的问题,即公共口译者的职业身份问题。公共口译就是为生活在社区中的人提供口译。公共口译要比会议口译和法庭口译出现得早,但在三种口译之中,公共口译最不被重视,在过去十年才开始争取成为一种专门职业。她提出了公共口译在现阶段所面临的几个问题,如公共口译的名与实;对公共性口译的标准的探讨;公共性口译从业者的培训;公共性口译是否能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等问题。作为口译的一种类型,公共口译在我们中国虽然还不是非常普遍,但是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和文化经济交流的日益频繁,我们也会面临公共口译的职业认定和职业要求问题。因此,罗伯茨教授的文章对我们中国学者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公共口译:一种正在争取承认的职业”)。译者的主体性常常都是隐没在具体的译文比较之中。上海外国语大学冯庆华教授和清华大学罗选民教授都以《红楼梦》的翻译为例,前者揭示译者的文化取向对译作风格的影响(“论译者的风格”),后者从文化层面探讨书名的翻译潜含着的文化互文的张力(“从互文性看《红楼梦》书名的两种英译”)。上海外国语大学姚君伟博士探讨的是中国著名作家、翻译家徐迟对美国文学的译介,这是对译者作为翻译主体认识的一个个案研究,揭示了译者对翻译择取与文化个性的关系(“徐迟与美国文学翻译”)。

口译是这次会议的又一个重要议题。美国蒙特利国际研究院鲍川运教授将在蒙特利国际研究院举行的一次中美贸易谈判作为分析个案,说明不准确、不恰当的翻译将给双语谈判带来困难和问题,从而对译员培训,特别是对研究生层次的连续翻译译员的培训,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建议(“口译在谈判中的作用”)。台湾辅仁大学杨承淑教授探讨了电视口译的形态及其对口译者的要求,以此提出口译教学的应承要求(“口译教学如何应承电视口译的需求”)。

翻译教学是历来翻译研讨会必不可少的内容之一,本次会议上不少中外学者在发言中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翻译教学问题。很多代表都是结合自己的翻译教学实践来展开对某一翻译问题的探讨的。加拿大圣文森特山大学朱迪思·伍兹沃丝教授介绍了文学翻译在加拿大的职业景况,她本人的文学翻译的经历以及她在文学翻译教学中如何将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结合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文学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文学翻译在民族文学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事实,但是在文学研究上,却常常忽视翻译文学的存在及其影响作用。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维果·佩德森教授在“翻译研究与文学史结合的诸种问题”一文中介绍了他在教授哥本哈根大学儿童文学课——一门试图将翻译研究与文学史研究结合起来的课程的教学经历,以具体的事例说明将文学研究与文学翻译研究结合起来的益处和困难。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年轻学者吴刚、龚芬对我国大学现在采用的一些传统教材和授课方式的利弊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应该反思大学本科翻译课的教学思想,这样在教材编写和具体的教学中才能避免顾此失彼的现象。大学本科的翻译教学应跳出“小而精”的模式,走向“大而杂”的路子,让翻译摆脱单纯的语言技能的角色,将各学科的新的研究成果糅合进去。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布里吉塔·迪米托罗娃提出了翻译教师培训的问题。她认为,译者和翻译研究者的培训与翻译教

师的培训侧重点应有不同。她介绍了瑞典培训翻译教师的一些做法和经验(“译员培训教师的培训与教学”)。

翻译是民族文化交往的产物,翻译也是文化交流的见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部译作都蕴含着各民族历史的积淀和各时代的烙印。

当我们编辑完这部翻译论著,时间正一分一秒地向 21 世纪接近。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日益明显,翻译正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1 世纪将是文化交往更为频繁的世纪,频繁的文化交流也越来越重视翻译的作用,不仅在量上对翻译提出要求,更在质上提出新的期待。作为翻译研究工作者,我们更感到一种时代的使命感。有学者预言,翻译研究将毫无疑问成为新世纪学术研究领域的显学。但愿我们这本汇集了几十名中外学者的研究和思考的翻译论文集,能对新世纪的学术显学作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谢天振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1999 年 3 月

目 录

第一章 翻译的性质与翻译理论 / 1 /

- 第一节 翻译的再现 / [英国]西奥·赫尔曼 / 1 /
- 第二节 翻译中的幻像与迷误 / 沈景炬 / 21 /
- 第三节 翻译:理论、实践与教学 / 朱纯深 / 39 /
- 第四节 文学翻译的过程 / 孙艺风 / 56 /

第二章 翻译的文化哲学透视 / 73 /

- 第一节 作者本意和本文本意——解释学理论与翻译研究 / 谢天振 / 73 /
- 第二节 海德格尔翻译思想试论 / 卫茂平 / 89 /
- 第三节 作为交往行为的翻译 / 杨恒达 / 97 /
- 第四节 语言哲学观照下的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 / 葛中俊 / 107 /

第三章 文化语境与翻译 / 119 /

- 第一节 “欧化”:“五四”时期有关翻译语言的讨论 / 王宏志 / 119 /
- 第二节 大众小说的翻译 / [巴西]约翰·弥尔顿 / 140 /
- 第三节 现代派文学在新时期译介的文化语境与译介策略 / 查明建 / 155 /
- 第四节 从互文性看《红楼梦》书名的两种英译 / 罗选民 / 174 /

II · 翻译的理论建构与文化透视

第五节 A. E. 霍斯曼的诗及其在中国的译介

/南治国 / 180 /

第四章 翻译的语言文化特性 / 188 /

第一节 翻译中的“相异性”与“相似性”之辨——对翻译

与文化交流关系的思考与再思考

/孟华 / 188 /

第二节 语言与文化特质之间的翻译

/〔比利时〕伊娃·科波丝姬 / 202 /

第三节 论影视翻译语言的一些特点 /夏平 / 208 /

第五章 中国的翻译与翻译研究 / 215 /

第一节 面对 21 世纪的中国译界 /林戊荪 / 215 /

第二节 特性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

的关系 /张南峰 / 223 /

第三节 谈新时期的翻译批评 /孙致礼 / 236 /

第四节 回顾与展望：中国翻译界十年大辩论

(1987—1997) /郭建中 / 247 /

第五节 中国翻译教学百年回顾与展望 /穆雷 / 266 /

第六节 中国近代翻译的特殊形态及思考 /王建开 / 284 /

第六章 翻译与文化身份 / 292 /

第一节 从早期香港的翻译活动(1842—1900)看翻译与

权力的关系 /张佩瑶 / 292 /

第二节 公共口译：一种正在争取承认的职业

/〔加拿大〕罗德·罗伯茨 / 310 /

第三节 论译者的风格 /冯庆华 / 329 /

第四节 译者的身份 /田德蓓 / 339 /

第五节 徐迟与美国文学翻译 /姚君伟 / 353 /

第七章 口笔译教学研究 / 364 /

第一节 口译教学如何应承电视口译的需求

/杨承淑 / 364 /

第二节 口译在谈判中的作用 / [美国]鲍川运 / 374 /

第三节 文学翻译教学: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 [加拿大]朱迪思·伍兹沃丝 / 383 /

第四节 翻译研究与文学史结合的诸种问题

/ [丹麦]维果·佩德森 / 395 /

第五节 翻译教师的培训与教育

/ [瑞典]布里吉塔·迪米托罗娃 / 401 /

第六节 关于大学本科翻译教学的几点思考

/ 吴刚 龚芬 / 413 /

附录: '98 上外翻译理论与翻译教学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摘编 / 423 /

Contents

Chapter I The Nature of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Theory / 1 /

1. Translation's Representations /Theo Hermans / 1 /
2. Myths and Misconceptions in Translation
/King-Hui Sin / 21 /
3. Theories, Practice and Teaching of Translation
/Zhu Chunshen / 39 /
4. On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Translating
/Sun Yifeng / 56 /

Chapter II Translation: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e Philosophy / 73 /

1.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uthor's Meaning and His Text's Significance in Translation: Viewed from Modern Hermeneutics Theories /Xie Tianzhen / 73 /
2. On Heidegger's Thoughts on Translation
/Wei Maoping / 89 /
3. Translation as Communicative Activity
/Yang Hengda / 97 /
4. Literary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ed Literature in the Perspective of Language Philosophy
/Ge Zhongjun / 107 /